

## 钱起部分诗歌系年

王定璋

钱起是中唐负有盛名的诗人。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称他：“员外诗体格新奇，理致清贍，越从登第，挺冠词林。文宗右丞，许以高格；右丞没后，员外为雄。”高氏乃中唐选家，他的评价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文坛的见解，对钱起评价之高，在“大历十才子”中是很特出的。随着历史的演进，对钱起的评价虽有变化，但仍褒多于贬。胡震亨称他“有盛唐遗响”（《诗薮》）。王世贞更说钱起的《省试湘灵鼓瑟》为省试诗中“亿不得一”的佳作（《艺苑卮言》）。当然也有对之不满指摘，《四库全书总目·钱仲文集提要》：“大历以还，诗格初变。开宝浑厚之气，渐远渐离。风调相高，稍趋浮响，升降之关，十子实为之职志。”不仅不满大历诗风，且认为钱起是其典型。建国以来大抵遵循这种贬抑性的批评，因此钱起这样的诗人完全被打入冷宫而无人问津。事实上，我们对钱起的研究是极不够的，就连他的生卒年都还没有搞清楚，就更别说其它情况了。傅璇琮《钱起考》作了一些研究，取得一些成果。本文将对钱起部分诗歌予以系年。鉴于钱起乃中唐大家，大历翘楚，保留下来的诗歌有四百余首，限于资料，要对之逐一系年，似不可能，同时钱诗中流连风景、歌咏隐沦、高蹈遗世之作不少，欲对这些诗歌予以准确系年，困难更大。这里仅略陈个人浅见，不当之处，望有识者指

正。

《秋霖曲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三），天宝十三载秋作。钱起为李晔天宝九载榜下以他那首为人熟知的《省试湘灵鼓瑟》诗而擢第，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（详《旧唐书·钱徽传》）。天宝十四载已尉蓝田（说详下），《秋霖曲》当为秘书省校书时之作。诗云：“君不见圣主旰食忧元元，秋风苦雨暗九门。凤凰池里沸泉腾，苍龙阙下生云根。阴精离毕太淹度，倦鸟将归不知树。愁阴惨淡时殷雷，生灵垫溺若寒灰……”。玩诗意，虽有秋霖成灾的苦况而无战乱动盪景象，当为安史之乱前的作品。考《旧唐书·玄宗纪》：“（天宝十三载）是秋，霖雨积六十余日。京城垣屋颓坏殆尽，物价暴贵，人多乏食，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，开十场贱粜以济民。”当为是诗“忧元元”之背景。又《资治通鉴》天宝十三载下：“上忧雨伤稼，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，曰：‘雨虽多，不害稼也。’上以为然。扶风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灾，国忠使御史推之。是岁，天下无敢言灾者。”其时困居长安的杜甫有《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》：“今秋乃淫雨，仲月来寒风。群木水光下，万家云气中。所思碍行潦，九里信不通……。”又《秋雨叹》：“阑风伏雨秋纷纷，四海八荒同一云。去马来牛不复辨，浊泾清渭何当分？禾头生耳黍穗黑，农夫田父无消息。城中斗米换衾裯，相许宁论两相值？”与《秋霖曲》所述情况一致。杜诗据《钱注杜诗》谓作于天宝十三载。

《初黄绶赴蓝田县作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二），天宝十四载作。是诗有：“眼中县胥色，耳里苍生言。居人散山水，即景真桃源。鹿聚入田径，鸡鸣隔岭村。滄和俗久清，到邑政空论。且嘉讼庭寂，前阶满芳荪。”一派和洽宁穆，雍熙恬静的太平盛世情景，殊非安史乱后景况可拟。按蓝田近处京畿，安史叛军袭破城池时，据《通鉴》载：“贼每破一城，城中衣服、财贿、妇人皆为所掠。男子，壮者使之负担，羸、病、老幼皆以刀槊戏杀

之。……”其惨象若此。蓝田的破坏，当也不轻，即便安史乱军撤出西京，亦非二、三年内可恢复至“桃源”景象！联系到《秋霖曲》诗，天宝十三载钱起尚在西京秘省校书，而《初黄绶赴蓝田县作》诗必为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前夕。又《县中池竹言怀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六）：“官小志已足，时清免负薪。卑栖且得地，荣耀不关身”，更可证明钱起之赴蓝田必为安史之乱之前。按安史之乱延续八年之久。待战乱敕平，已是广德元年（763）了，其时钱起已入尚书省为郎官了（钱起入省时间见《登刘宾客高斋》诗之系年）。“时清”是能说明问题的。同载于《通鉴》宝应元年下：“回纥入东京，肆行杀略，死者万计，火累旬不灭。……比屋荡尽；士民皆衣纸。……”其时安史之乱已接近尾声，尚且如此，设若安史贼焰方炽之时，其地方糜烂是不难想象的。因肃宗急欲得京师，竟与回纥约曰：“克城之日，土地、士庶归唐，金帛、子女皆归回纥。”（《通鉴》至德二载）这样不仅系出《初黄绶赴蓝田作》，也考订出钱起由校书郎迁蓝田尉的时间。《晚归蓝田酬王维给事赠别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四），也提供了钱起尉蓝田时间的另一证据。此诗虽一作王维诗，但赵殿成《王右丞集笺注》注中引《唐诗纪事》云：“起还蓝田，王维赠别云：‘草色日向好，桃源人去稀’云云，起答诗云：‘卑栖却得性，每与白云归。’是为互相酬答之作也。细玩知音青琐闱之句，合是钱作无疑。”所见良是。又，赵殿成《王右丞年谱》称王维天宝十五载为给事中，与《旧唐书·本传》：“天宝末，为给事中”相合。王诗：“草色日向好，桃源人去稀。手持平子赋，目送老莱衣……”，钱诗“卑栖却得性，每与白云归。徇禄仍怀桔，看山免采薇。……”二人诗歌同系优游闲放，追慕隐沦的情致，必为安史乱前。

《别张起居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五），至德元年六月作。按是诗题下自注：“时多故”。诗中又有：“风涛初振海，鹓鹭各辞

林。旧国关河绝，新秋草露深。陆机婴世网，应负故山心。”所谓“时多故”，即指安史之乱。参合风涛振海、鹈鹭辞林，正是玄宗为安史乱军攻陷潼关，仓皇逃蜀而百官逃窜无所依归的写照。鹈鹭常用以比百官朝列。《隋书·音乐志》：“怀黄绶白，鹈鹭成行。”岑参诗：“鹈鹭千官列，鱼龙百戏浮。”可证。《通鉴》至德元载：“甲午，百官朝者什无一二。……是日，上移仗北内。……百官犹有入朝者，至宫门，犹闻漏声，三卫立仗俨然。门既启，则宫人乱出，中外扰攘，不知上所之。于是王公、士民四出逃窜，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，盗取金宝，或乘驴上殿。……”而所谓陆机婴网是指公职（蓝田尉）在身，归隐故山似未可能。

《李四劝为尉氏尉李七勉为开封尉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七），天宝末，约为天宝十三、四载间作。李劝事迹无考，李勉却屡见于钱起诗中（详后）。《旧唐书·李勉传》：“勉幼勤经史，长而沉雅清俊，宗于虚玄，以近属陪位，累授开封尉。时升平日久，且汴州水陆所凑，邑居庞杂，号为难理，勉与联尉卢成轨等，并有擒奸擿伏之名。至德初，从至灵武，拜监察御史。”则可知勉于天宝末，安史乱前尚为开封尉，且有治理地方的能名。联系钱诗中有“黄绶俄三载，青云未九迁”，则勉之为开封尉为时不短。又《旧唐书》本传谓勉卒于贞元四年（788），年七十二。则勉之生年当为716年，亦即开元四年，年龄较钱起略小，亦可推知勉之为开封尉已三十五、六岁了。

《送裴迪侍御使蜀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八），按裴迪或作颀，岑仲勉《唐人行第录》：“裴十迪，少陵集九《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》，又《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》，迪出洗马房后。全诗二函王维有《赠裴十迪》、《酌酒与裴迪》等篇。”按裴迪于蜀中最早的记载是杜甫于上元元年底答裴之作《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》（见《钱注杜诗》），而裴迪与王

维泛舟辋川，“弹琴赋诗，啸咏终日”当在此之前之乾元元、二年间。迪于上元元年岁暮已在蜀中有咏梅之章（裴诗已亡逸，仅从杜甫和诗可推知），则裴之入蜀必在乾元末上元元年初，今系于上元元年初。钱诗：“柱史才年四十强，须髯玄发美清扬。……锦水繁花添丽藻，峨眉明月引飞觞。”据诗中反映的时令，则更可确知为上元元年春。所谓四十强，不过四十一、二，又可进一步推知裴之生年似应在718~719之间，比李白、杜甫、王维都要年轻，可补裴生平资料之阙。而《钱考功集》卷四中《裴迪南门秋夜对月》应做于上元元年之前。

《初至京口示诸弟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五），上元二年或稍后作。诗云：“还家百战后，访故几人存。兄弟得相见，荣枯何处论。新诗添卷轴，旧业见儿孙。点检平生事，焉能出荜门。”一派兵燹之后的忧伤凋弊景象。按钱起家乡吴兴以及诗中所称之京口（江苏南京附近）未尝为安史乱军所扰，中原横溃，皇舆播越，士庶纷纷逃至江南避祸。李白《扶风豪士歌》：“我亦东奔向吴国，浮云四塞道路赊。东方日出啼早鸦，来醉扶风豪士家。”萧士贇注云：“言道路艰阻，京国乱离，而东土之太平自若也。”可资佐证。《通鉴》又载：“平卢军大掠十余日。安史之乱，乱兵不及江淮，至是，其民始罹荼毒矣。”（上元二年）然钱起却说“还家百战后”，究系何指？考《通鉴》上元元年十一月下：“御史中丞李铤、宋州刺史刘展皆领淮西节度副使。铤贪暴不法，展刚强自用，故为其上者多恶之……”。这样就由节度使王仲升与内左常侍邢延恩设计除掉刘展。平心而论，刘展固刚愎难治却无割据野心，且长于用兵，刘之作乱，几近逼迫。《通鉴》又载：“延恩知展已得其情，还奔广陵，与李峒、邓景山发兵拒之，移檄州县，言展反。展亦移檄言峒反，州县莫知所从。峒引兵渡江，与副使润州刺史韦儼、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屯京口，邓景山将万人屯徐城。……李峒辟北固为兵场，插木以塞江口。展军

于白沙，设疑兵于瓜洲。……岷悉锐兵守京口以待之。展乃自上流济，袭下蜀。岷军闻之，自溃，岷奔宣城。甲午，展陷润州”。战争即在杭州、苏州、常州、京口、金陵、湖州（吴兴）一带。其后朝廷派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击展，祸乱始平。平卢悍兵对江南“大掠，杀商胡以千数，城中地穿掘略遍”（同上）。军阀混战，殃及地方，这就是钱诗中所谓“还家百战后，访故几人存”的背景。钱起盖于刘展乱后归省而赋上诗。《归故山路逢邻居隐者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四）有：“握手云溪路，潸然恨几重。谁知绿林盗，长占彩霞峰……”。当与上诗为先后之作。或谓此诗所述为袁晁起义事，非。袁活动地盘，据《通鉴》载为台州、衢州、信州、温州、明州等浙东和江西一带，未见其波及浙江北部及江苏等地。

《登刘宾客高斋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八），广德二年春月作。是诗中之刘宾客，乃著名理财家刘宴。《新唐书·刘宴传》：“代宗立，复为京兆尹，户部侍郎，领度支、盐铁、转运、铸钱、租庸使。宴以户部尚书让颜真卿，改国子祭酒。又以京兆尹让严武，即拜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使如故。坐与程元振善，罢为太子宾客。”宴之罢为太子宾客的时间，本传不载，但《通鉴》广德二年正月下有：“癸亥，以刘宴为太子宾客，李峴为詹事，并罢政事，宴坐与程元振交通。”《新唐书宰相表中》所载时间同。钱起是诗题一作《春题刘相公山斋》，可考知刘相肯定为刘宴无疑。因代宗朝刘姓宰相并罢为太子宾客者仅宴一人。而诗题下自注“时公初退相”，所写“蝴蝶晴连池岸草，黄鹂远出柳园花”春景，与宴正月罢相时令殊合。诗中“能以功成疎宠位，不将心赏负云霞。”与《新唐书》本传载：“禄山乱，避地襄阳。永王璘署宴右职，固辞……。会王败，欲略州县，闻宴有备，遂自晋陵西走，终不言功”相符。鉴于钱起《题郎士元半日吴村别业兼呈李长官》诗作于宝应二年春（是年闰正月，傅

《钱起考》已系年，无意掠美，不赘），而广德二年初刘宴罢相时钱起已在长安，故由《登刘宾客高斋》诗与《题郎士元》诗又可考知钱起入省为郎之时间必为广德元年（763）春天以后，广德二年春刘宴初退相之前。

《送弹琴李长史往洪州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五），广德二年或略前作。此李长史殆即李勉。钱诗云：“抱琴为傲吏，孤棹复南行。几度秋江水，皆添《白雪》声。佳期来客梦，幽期缓王程。佐牧无劳问，心和政自平。”勉之洪州刺史，两唐书本传缺载。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：“广德二年九月己酉，江南西道观察，洪州刺史张镐卒。”未言继任者，下面又云：“仍命洪州刺史李勉副知选事。”意者，镐卒前勉已为洪州长史，镐卒，即以勉为刺史。李肇《唐国史补》：“李汧公（勉）雅好琴，常斫桐，又取漆桶为之，多至数百张，求者与之。有绝代者，一名响泉，一名韵磬，自宝于家。”乃知李勉擅弹琴，与诗中“抱琴”“《白雪》”颇合。《旧唐书》本传谓勉：“坦率素淡，好古尚奇，清廉简易，为宗臣之表。善鼓琴，好属诗，妙知音律，能自制琴，又有巧思。……”。《新唐书》本传亦载：“善鼓琴，有所自制，天下宝之，乐家传‘响泉’、‘韵磬’，勉所爱者。”与钱诗合。而勉“心和政平”亦与本传谓“清廉简易”合拍。

《离别夜雨寄李京兆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一），大历二、三年间作。诗中李京兆亦为李勉。考代宗朝之京兆尹且可能与钱起交往者：刘宴（宝应元年）、严武（宝应二年）、第五琦（广德元年）、黎干（永泰二年）、崔昭（大历元年）、李勉（大历二年）、孟皋（大历三年）、贾至（大历五年）、杜济（大历八年前）、于颀（大历八年）、黎干（大历九年）、严郢（大历十四年），而李姓者仅勉一人。且勉与钱起结交于微时（详前勉为开封尉之考证）。钱诗有“如何琼树枝，梦里看不足”等语，亦非泛泛之交口吻，而勉之为京兆尹，据《旧唐书》本传，“大历二年，来

朝，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，政尚简肃。”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：“（大历二年）夏四月己亥，以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，洪州刺史李勉为京兆尹……”。同书又载：“（大历三年）冬十月乙未，以京兆尹李勉为广州刺史，充岭南节度使。”则钱诗应作于此期间，而《京兆尹厅前甘棠树降甘露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二），当与上诗为先后之作。诗称：“内史用尧意，理京宣惠慈。气和祥则降，孰谓天难知。”与本传所谓：“拜京兆尹……政尚简肃”极愜。

《送李大夫赴广州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二），大历三年冬十月作。李大夫即李勉。《旧唐书》本传称：“大历二年来朝，拜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。……四年，除广州刺史，兼岭南节度观察使。”但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却云勉之任命为大历三年冬十月（见前）。参见钱诗有：“龙镜逃山魅，霜风破嶂雪”等语，及杜甫大历三年在衡州所作《衡州送李大夫七勉赴广州》诗：“北风随爽气，南斗避文星。”时令均为隆冬景象，可知勉之任命及钱之送别当在大历三年十月，至广州已是翌年初了。钱诗复有：“一贤间气生，麟趾凤凰羽”。与勉之为“郑王元懿曾孙也”吻合。

《苦雨寄皇甫冉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一），大历三、四年间作。皇甫冉之事迹见于《新唐书·萧颖士传》下：“皇甫冉字茂政，十岁便能属文，张九龄叹异之。与弟曾皆善诗。天宝中，踵登进士，授无锡尉。王缙为河南元帅，表掌书记。迁累右补阙，卒。”独孤及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》（《毗陵集》卷十三）亦说：“举进士第一，历无锡县尉，左金吾兵曹。今相国太原公（王缙）之推轂河南也，辟为书记。”则知钱与皇甫冉之过从当为冉入朝为补阙之时。《旧唐书·王缙传》：“其年（广德二年）河南副元帅李光弼薨于徐州，以缙为侍中、持节都统河南、淮西、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。……”则冉之受辟当在广德二

年。但何时入京为补阙的？独孤及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》：“大历二年，迁左拾遗，转右补阙。奉使江表，因省家至丹阳，朝廷虚三署郎位以待君之复，不幸短命，年方五十四而没。”（《毗陵集》卷十三）皇甫冉之卒年虽不易确定，当在大历二年后的四、五年间。故系上诗于大历三、四年。

《送郎四补阙东归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五），大历元、二年间作。郎四，据岑仲勉《唐人行第录》：“郎四士元，字君胄，全诗四函钱起《送郎四补阙东归》，又《东皋早春寄郎四校书》。按纪事四三只言士元历拾遗，然补阙亦当所历之官，高仲武以钱、郎并论，郎四为士元无疑也。”《全唐诗》小传：“（郎士元）天宝十五载擢进士第，宝应初选畿县官，诏试中书，补渭南尉，历右拾遗，出为郢州刺史……”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丁部集录别集类：“郎士元，诗一卷”，下谓：“字君胄，中山人。宝应元年选畿县官，诏试中书，补渭南尉。”未叙历官校书及补阙事。按钱起《东皋早春寄郎四校书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六）：

“微禄赖学稼，岁起归衡茅。穷达恋明主，耕桑亦近郊。……蓬莱时入梦，知子忆贫交。”玩诗意，钱、郎都还沉沦下僚而官未迁于郎署（郎亦历官员外郎，详下）。可推知郎之校书蓬山当在渭南尉前（宝应元年之前），虽郎之入京为补阙之时间固难确考，但必在永泰二年初。郎集中有《送杨中丞和蕃》是重要线索。杨中丞即杨济。《通鉴》大历元年二月下：“己亥，命大理少卿杨济修好于吐蕃”。《旧唐书·吐蕃传》：“永泰二年二月（即大历元年，是年十一月改元），命大理少卿兼御史中丞杨济修好于吐蕃”。与郎诗：“锦车登陇日，边草正萋萋”殊合。又，郎尚有《奉和杜相公益昌路作》诗：“春草梁山正落花，台衡受律向天涯。……已见庙谟能喻蜀，新文更喜极京华。”乃送杜鸿渐于大历元年二月入蜀平乱事（见《通鉴》）。故知郎士元于永泰元、二年间已由渭南入京，鉴于郎不久即为员外郎了，故系上诗于大

历元、二年或略后。

钱起尚有《郎员外见寻不遇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九），此郎员外亦即郎士元。郎之为员外郎不载于各种资料，然与钱、郎过从甚密的卢纶诗集中有《客舍苦雨即事寄钱起郎士元二员外》（《全唐诗》卷二百七十八）可证，是诗与钱诗当为郎迁员外郎后，郢州刺史之前所作。钱起《寄郢州郎士元使君》，虽不可确考写作年代，但必作于大历中期或谓大历八年前后，根据之一是郎出刺郢州已届暮年是没有问题的。郎《送彭偃房由赴朝因寄钱大郎中李十七舍人》，诗中钱大即起（《唐人行第录》），诗云：“衰病已经年，西峰望楚天。风光欺鬓发，秋色换山川。寂寞浮云外，支离汉水边。……”不仅点明赋诗之地为郢州，且显系迟暮。郎《郢城秋望》：“白首思归归不得，空山闻雁雁声长。”更可说明郎为郢州刺史已颇老迈。根据之二是大历中期郎已在长安消逝其行踪。钱起于大历九年所赋《奉和中书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》诗，和者有以诗文著称之包佶、司空曙、独孤及等人，（是诗之系年见下考）而无郎之和作。按高仲武的说法，钱、郎以写奉和及祖送诗歌著称，偏巧看不见郎之和者，是郎于大历八年已离长安之又一证据。

《送陆珽侍御使新罗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五），大历三年作。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：“（大历三年）春正月甲子，册新罗王金乾运母为太妃。”又《旧唐书·东夷传·新罗》：“大历二年，宪英卒，国人立其子乾运为王，仍遣其大臣金隐居奉表入朝，贡方物，请加册命。三年，上遣仓部郎中，兼御史中丞，赐紫金鱼袋归崇敬持节齎册书往吊册之。以乾运为开府仪同三司、新罗王，仍册乾运母为太妃。”归崇敬使新罗还有皇甫冉、李端等的《送归中丞使新罗》（冉诗见《全唐诗》卷二百五十，李诗见《全唐诗》卷二百八十六）为证，然未言陆珽使新罗。不过《新唐书·东夷传·新罗》较详：“大历初，宪英死，子乾运立，甫卯，遣金隐

居入朝待命。诏仓部郎中归崇敬往吊，监察御史陆珽，顾愔为副册授之，并母金为太妃。”故可考知钱起是诗之系年。而《重送陆侍御使日本》，史籍缺载。但《通鉴》大历六年：“成都司录李少良上书言元载奸赃阴事，上置少良于客省。少良以上语告友入韦颀，殿中侍御使陆珽以告载。载奏知，上怒，下少良、颀、珽御史台狱。御史奏少良、颀、珽凶险比周，离间君臣。五月，戊申，敕付京兆，皆杖死。”则可知陆珽出使日本之时间，应在大历四、五年间。因大历三载陆使新罗，重送必在其后，杖死之前。

《奉和中书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七），大历九年秋作。是诗作《奉和……二侍御》，误，当作“侍郎”。按钱诗乃奉和常舍人袞《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》（见《全唐诗》卷二百五十四），常袞之诗可订正钱诗传刻之误。《旧唐书·常袞传》：“袞，天宝末举进士，历太子正字，累授补阙，起居郎。宝应二年选为翰林学士、考功员外郎中、知制诰，依前翰林学士。永泰元年迁中书舍人。袞文章俊拔，当时推重，与杨炎同为舍人，时称常杨……。大历元年，迁礼部侍郎，仍为学士。……”但《旧唐书》所记袞迁礼部侍郎之时间显系有误。《通鉴》：“（大历元年）甲辰，以鱼朝恩行内侍监、判国子监事。中书舍人常袞：‘成均之任，当用名儒，不宜以宦者领之。’”又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：“大历九年夏四月甲申，中书舍人常袞率两省宦一十八人诣阁请论事，诏三人各尽所怀。”同书又载：“（大历九年）十二月庚寅，以中书舍人杨炎，秘书省监韦肇并为吏部侍郎，中书舍人常袞为礼部侍郎。”可据此订正《旧唐书·常袞传》载袞之迁礼部侍郎时间之误。而要考订钱诗之系年，还必须弄清徐薛二侍郎为何人。常袞诗之和作除钱起外，还有司空曙、包佶、独孤及等人，诗题与钱起完全相同，但都作“侍郎”（独孤及作“侍御”）。这样足可订正钱诗侍御是讹字。司空曙之诗载《全唐诗》卷二百九十三、包佶诗卷二百五、

独孤及诗卷二百四十七。)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：“(大历八年)二月甲子，御史大夫李栖筠弹吏部侍郎徐浩。……徐浩、薛邕违格，并停知选事。”但此事《通鉴》记载稍详：“(大历八年)吏部侍郎徐浩、薛邕，皆元载、王缙之党，浩妾弟侯莫陈怵为美原尉。浩属京兆尹杜济虚以知驿奏优，又属邕拟长安尉。怵参台，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状，敕礼部侍郎万年于邵等按之。邵奏邕罪在赦前，应原除，上怒。夏，五月，乙酉，贬浩明州别驾，邕歙州刺史；丙戌，贬济杭州刺史，邵桂州长史，朝廷稍肃。”《新唐书·徐浩传》亦载：“召拜吏部侍郎，与薛邕分典选。浩有妾弟冒优，托之邕，拟长安尉，御史大夫李栖筠劾之，帝怒，黜邕歙州刺史，浩明州别驾。”故可知诗中之徐薛二侍郎当为徐浩薛邕。参之钱诗：“旧僚云出矣，晚岁复何如？海峤瞻归路，江城梦直庐。……”海峤，江城，即指徐薛贬所。而包佶诗也有：“左宦登吴岫，分家渡越溪。”与司空曙诗：“颜谢征文并，钟裴直事同。离群惊海鹤，属思怨江枫。地远姑苏外，山长绝越东。……”点明徐(越绝)薛(姑苏)之贬窜地域。当然独孤及诗更觉显豁：“差池摧羽翮，流落限江湖。禁省一分袂，昊天三雨霜。……”“摧羽”、“流落”，足以说明问题。而常袞诗中有“移秩东南远，离忧岁月除。承明期再入，江海意何如？”可知常袞诸人唱和赋诗时，距徐薛被贬业已度岁。结合常袞于大历九年十二月迁礼部侍郎，则钱起诸人之作，必为大历九年秋无疑。

《送萧常侍北使》(《钱考功集》卷五)，大历三年七月作。此萧常侍非别人，乃荐来瑱为颍川太守抗击安史乱军之萧昕。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：“(大历十二年)十一月癸酉，以右散骑常侍萧昕为工部尚书。”则可知在此之前萧昕为右散骑常侍。所谓北使，即《新唐书·萧昕传》：“大历中，持节吊回纥。回纥恃功，廷让昕曰：‘乃中国乱，非我无以平，奈何市马不时归我直？’众失色，昕徐曰：‘国家龔定寇难，功虽丝毫不遗赏，况邻国乎？’

……”面责回纥，完节而还。此称大历中乃大历三年。《通鉴》：“（大历三年）回纥可敦卒，庚辰，以右散骑常侍萧昕为吊祭使。……”然此材料盖源于《新唐书·回纥传》：“大历三年，光亲可敦卒，帝遣右散骑常侍萧昕持节吊祠……”当为钱诗之背景。

《送蒋尚书居守东都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七），大历七年五月作。蒋尚书即蒋涣而非蒋琼。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：“（大历七年）五月，癸亥，以检校礼部尚书蒋涣充东都留守。”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：“（大历八年）九月，甲午，东都留守蒋琼兼知东都贡举。”固蒋琼亦为东都留守，但从现存资料言，未尝见蒋琼历官尚书。

《送严维尉河南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八），上元元、二年作。严维的生平，《全唐诗》小传：“至德二载进士，擢辞藻宏丽科，调诸暨尉，辟河南幕府。……”未言尉河南之时间。另据《唐诗纪事》：“严维，字正文，越州人。与刘长卿善。……维作越之诸暨尉，刘随州以诗送云：‘爱尔文章远……’维留别云：‘中年从一尉，自笑此身非。道在甘微禄，时难耻息机。晨趋本郡府，昼掩故人扉。待见干戈毕，何妨更采薇。’终校书郎。”虽也无法确考尉河南时间，但为诸暨尉已届中年是可以肯定的。《唐才子传》称严：“至德二年，江淮选补侍郎崔涣下以词藻宏丽进士及第，以家贫亲老，不能远离，授诸暨尉，时已四十余。后历秘书郎，严中丞节度河南，辟佐幕……”更明谓严授诸暨尉已四十余岁，与严维诗中年差合。参之钱起《送严维尉河南》：“蕙叶青青花乱开，少年趋府下蓬莱。甘泉未献扬雄赋，吏道何劳贾谊才”。此时严维年岁尚轻（少年），而严维之尉诸暨自称中年，因此，可以推知严之尉河南应在作诸暨尉之前。细玩钱诗，“少年趋府下蓬莱”，则维尉河南前已在蓬山校书了。按严维至德二载登第，殆其后即在秘省校书，后严中丞之辟而尉河南的。这里

只要考订为河南尹之严中丞为何人，则是诗系年即能确定。岑参有《虢州南池候严中丞不至》据《岑参集校注》（陈铁民、刘忠义校注）引《岑诗系年》：“严中丞谓严武。《旧唐书》一一七《严武传》曰：‘既收长安，以武为京兆少尹，兼御史中丞。’……疑严武于上元元年代李若幽为河南尹。御史中丞是武任河南尹时的兼职，《唐才子传·严维传》曰：‘严中丞（严武）节度河南，辟佐幕府。’”准此，则严维蓬山校书不过四年光景（至德二年至上元元年），若严维二十余岁登第，四年之后入幕严武仍不满三十，勉强可称少年。若谓严维由诸暨尉转河南尉已四、五十岁，则无论如何未便目之少年的。何况“下蓬莱”是不可忽视的线索。联系到严武于上元二年已出镇四川，故系钱诗于上元元、二年间。（附注，《唐才子传》及《唐诗纪事》均谓严维先尉诸暨，后赴河南，则严维不可能入严武幕的，武于大历元年已卒。另傅璇琮《钱起考》系钱诗于大历十二三年，似误。）

《奉陪郭常侍宴浈川山池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七），建中初年作。郭常侍即郭子仪暖第六子暖。《旧唐书》本传：“暖，子仪第六子。年十余岁，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，时昇平年亦与暖相类。……大历十三年，有诏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磴，以妨民溉田。昇平有脂粉磴两轮，郭子仪私磴两轮，所司未敢毁彻。公主见代宗诉之，帝谓公主曰：‘吾行此诏，盖为苍生，尔岂不识我意耶？可为众率先。’……暖检校左散骑常侍。建中末，公主坐事，留之禁中，暖亦不令出入。既而朱泚之乱，不知车驾幸奉天，为贼所逼，欲授伪官，暖辞以居丧被疾。既而与兄晞、弟曙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。德宗喜，并释前咎，待之如初，复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。……”则暖曾于大历末（建中初）与兴元初两度检校左散骑常侍，但暖之检校左散骑常侍的时间可由《通鉴》大历四年五月的一条史料推知：“郭子仪以司徒、中书令领河中尹、灵州大都督、单于镇北大都护、关内河东副元帅、朔方节度、…

…权任既重，功名复大，性宽大，政令颇不肃。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，久不决。甲申，诏尊子仪为尚父，加太尉兼中书令，增实封满二千户，月给千五百人粮，二百马食，子弟、诸婿迁官者十余人，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……”。暖之加检校左散骑常侍当在其时。《旧唐书·郭子仪传》下附长子曜传云：“建中初，子仪罢兵权，乃遍加诸子官，以曜为太子少保。”可证以上推测是正确的。故系钱起诗于建中元年。而《陪郭常侍令公东亭宴集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七）当与上诗为先后之作，史称郭家良田美器、名园甲宅、声色珍玩，堆积羨溢，不可胜计（《旧唐书·郭子仪传》）。虽然子仪三子晞曾于永泰二年检校左散骑常侍，但其仅以骑射武勇著称，而暖据李肇《唐国史补》：“郭暖，昇平公主驸马也。盛集文士即席赋诗，公主帷而观之，李端中宴诗成，有荀令、何郎之句，众称妙绝，或谓宿构。端曰：‘愿赋一韵’。钱起曰：‘请以起姓为韵’。复有金埒铜山之句，暖大出名马金帛遗之。……”因可考知钱起李端等人所予郭常侍之宴应为暖而非晞也。（《新唐书·文艺·卢纶传》下附李端事与李肇所记略同，不赘）

《禁闾玩雪寄薛左丞》（《钱考功集》卷七），建中元年作。薛左丞即前所述之薛邕。邕于大历八年坐勾通徐浩，一齐遭贬，后为德宗起用。按自代宗及德宗前期（钱起可能与之交往者）为尚书左丞名籍可考者：杨綰、李涵、蒋涣、张重光、薛邕。《旧唐书·德宗纪》：“（建中元年）十月，甲午，贬尚书左丞薛邕为连山尉，坐赃也。”甚简略。然《通鉴》稍详：“（建中元年）上以宣歙观察使薛邕，文雅旧臣，征为左丞；邕去宣州，盗隐官物以巨万计，殿中侍御史员宇发之。”邕在代宗朝时（大历八年）被贬歙州刺史，德宗即位被起用，但薛之任尚书左丞为时甚暂，钱起之诗当作于薛之被起用之后遭贬之前，即建中元年十月前，这是《钱考功集》中能系年之较晚的作品了。钱诗中有玩雪豪兴，虽

已老迈，身体似乎颇健康，因之，有理由说钱起在建中元年是健在的，他的卒岁，当在建中末了。故傅璇琮同志说“在此之后（按指大历十二、三年间），就未见记载他行迹的诗篇了”（《钱起考》），是不确的。

以上是笔者从现存资料多方勾稽理出的端绪。当然钱起的其它诗歌虽不易系年，但还可以系出时限来的。比如那些嗟叹不遇，悲怨不平，牢愁满腹之类诗歌必作于天宝九年及第之前，而咏及蓝田风物，黄绶铜章之怨应在蓝田尉任上……，如此等等。不过那已不是本文涉及的主要内容了。

1983、8、初稿 1983、12、改稿

## 《中国历代年谱总录》条目辨正

近检《中国历代年谱总录》一书，（杨殿珣编，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出版）发现若干条目有误，（有的可能是校对之误）现正误如下：

1. 页45“徐穉”条 按：“徐穉”应作“徐稚”。“穉”乃“穉”之误，“穉”今作“稚”。《辞海》（修订本）亦作徐稚。另，页510、511索引条目“徐穉”均误。

2. 页91“冯延巳”条 按：据夏承焘先生考证，“冯延巳”应作“冯延已”。（见《唐宋词人年谱》），《辞海》（修订本）亦作“冯延巳”。

3. 页176“沈环”条 按：“沈环”应作“沈璟”。《辞海》（修订本）亦作沈璟。另，页473索引条目“沈环”亦误。

4. 页206“张尔歧”条 按：“张尔歧”应作“张尔岐”。《辞海》（修订本）亦作张尔岐

5. 页64“真谛”条 按：真谛卒年为“陈太建元年（569）”。作“梁太建元年”，误。

6. 页110“叶梦得”条 按：叶梦得生年为“宋熙宁十年（1077）”。作“宋熙宁七年（1077）”，误。

7. 页128“刘燠”条按：刘燠卒年为“宋嘉定九年（1216）”。作“嘉定九年（1217）”，误。

（下转194页）